

北京大学文化书法研究丛书

书法文化精神



王岳川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J292.1/74

2008

书法文化精神

王岳川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法文化精神 / 王岳川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4

(北京大学文化书法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3592-1

I. 书… II. 王… III. 汉字—书法—研究 IV. 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6336号

书 名: 书法文化精神

著作责任者: 王岳川 著

责任编辑: 徐文宇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3592-1/J · 019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20.75印张 350千字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0.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总序

北京大学的书法艺术传统深厚，可谓渊源有自、名家辈出。北大百年，在书法实践和理论建设上有着艰难而辉煌的历史。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继承北大艺术教育传统，坚持自身的人文精神和书法文化特性，显示出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的特色。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传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敬业精神，切实地推动着北大书法艺术教育与研究，并正为中国书法文化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北大书法重视“书法文化”，进而倡导“文化书法”。书法是东方文化中重要的艺术文化，东方书法精简为黑的线条和白的纸面，黑白二色穷极线条流变和章法演化，暗合中国哲学最高精神“万物归一”之道。书法是“汉字文化圈”高妙的文化精神活动，走出汉字文化圈以外，比如欧美也可能有艺术字体，但是它们没有将文字的“书写”转变成用圆软毛笔书写的高妙徒手线艺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书法是东方文化精神上的高迈境界——最能代表东方艺术和汉字文化圈的文化精神形象。

大学是大师汇聚之地，是思想和艺术传承之所。大学书法强调将中国文化精神通过书法传承下去，以影响莘莘学子的文化精神编码。因此，大学书法不仅讲求书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书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大学书法的本质意义在于其文化根基，传达出当代学者对汉文字的审美书写和汉字文化圈的文化遗产。《礼记·大

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书法以其深宏的文化为背景，正惟此，文化成为了书法的底色和生命，没有文化的书法仅仅是技法的展示而没有真正的生命力。那种仅仅张扬个性的奇思怪想的所谓反传统书法，恰恰违背了书法刚健清新的文化精神。

强调“文化书法”的办学理念，意在强调书法和文化之间非此不可的联系。而面对全球化时代多种文化症候和书法文化处境而提出“文化书法”的观念，意在强调大学书法通过其文化追求呈现“书法中国”的文化指纹，进而重申中国书法的文化根基和文化本源。文化是书法的本体依据，书法是文化的审美呈现。书法是“无法至法”的艺术形式，分内法和外法，内法包括笔法、字法、墨法、章法等，外法包括生命之法、境界之法和精神之法。书法超越技法而成为直指心性的文化审美形式，从中展现出生命的境界和哲学的意蕴。书法要达到炉火纯青绝不能满足于技法，真正的书法家都是在“技进乎道”的历练修为中去追求宇宙大化的心性价值，那些止于技滞于巧的书法是不足观的。

“文化书法”是北大书法所强调的书法教育纲领和书法文化身份的体现。北大作为中国教育的最高学府，在一个世纪的风云中坚守着重要的价值担当工作：一是思想启蒙解放，这是百年北大的精神魅力所在；二是学术前沿探索，全面地伸展着大学独特的学术触角，推动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并同世界前沿学科进行平等对话；三是文化艺术的精神重塑。20世纪初蔡元培先生对艺术教育十分重视，不仅在北大讲授美学美育课，还在北大组织“音乐传习所”、“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聘请徐悲鸿、沈尹默、陈师曾、陈半丁等一批著名艺术家到北大授课和指导学生接受传统文化艺术熏陶。现代艺术在中国出现时就进入了北大研究视野，这使得北大成为一所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多元并存的大学，一所艺术气氛相当浓厚的大学及全国美育和艺术教育的中心，在书写实践或理论建树上都有着辉煌的历史。到20世纪后期，北大艺术学科重新受到重视，书法再次被引入北大文化理论教学体系，表明中国最高学府的学科分类设置和观念拓展有了新的维度，凸现了新世纪综合性大学对大学的使命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新认识。这种文、理、艺术学科三位一体的格局，将使校园学者和学生成为活生生的、有智商、有情商，而且还有“美商”的全面发展的的人。

“书法文化”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书法不仅有了自己的跨文化的国际眼光，而

且有了文化精神启蒙的书法问题意识。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一定要弄清：中国书法是否一定要被西方化掉？是否东方话语必然就只能在西式现代性话语中成为非我的形式？或许解决书法传统与现代矛盾的办法是：找到西方和东方文化精神内核中具有人类共同性的审美形式，如空间张力、视觉冲击力、抽象变形，或如铁划银钩的干练精纯、枯笔渴笔的高古超迈，并加以审美创新。并不是那些已为西方现代化、后现代化影响的狂躁的“书法”，才是现代的吸引眼球的东西。一种完整的书法生态美学观，应该在获得世界性的审美共识的形式框架中，注入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和东方魅力，这才是中国传统向现代转型、现代传承传统的必由之路。

北大书法教育的重要特点在于它能够打破那种专科院校单一的美术史、美术技法、美术理论、美术观念方面的教学模式，而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双科、多科乃至全科的训练，使书法研究生、博士生朝“双语精英”和文化艺术底蕴丰满的“学者型艺术家”方向努力。必要的学术文化训练可以修正书法界的急功近利倾向，还可以为真正的书法家提供文、史、哲、考古等知识型阐释的文化平台，使得“依仁游艺”、“立己达人”成为可能。

为了进一步提升文化书法理论研究和大学书法创作实践，我们主编了这套《北京大学文化书法研究丛书》，邀请国内外知名的书家及教授撰写专著，分成若干辑陆续出版。通过对书法理论的总结和反思，使大学书法的新思维能够推广到民间而成为大众的思想，进而能够在国际书法文化交流中逐渐成为新世纪影响他国书法的新理念。当然，凡是文化创新必有其理论盲点和误区，书法文化的创新同样如此，因此，我们等待社会各界的批评教正。

是为序。

金开诚 王岳川

2007年9月9日于北京大学

◎序

学术与艺术互动

在当代学术界，王岳川教授是一位富有独特造诣的学者。他在文艺本体论研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研究、文艺美学与文化研究、西方文化思潮研究等方面都有很深的研究，并且总是面对学术的难点与疑点问题，深入致思，独成己见。他的许多著述，思维跨度很大，又兼有充分的思想深度，每次读来都让我眼目一新。他提出的许多学术问题，例如文艺研究中的本体论意义、现代性与当代文化价值建设、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跨文化对话、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输出、21世纪中国文化命运等，都是当代学术的前沿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他阐发的见解，在当代中国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进行学术思考和研究对话中，王岳川教授在书法理论和书法创作领域也倾注了大量精力，并为当代中国书法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著有《书法艺术美学》、《中国书法文化精神（韩文版）》，主编了洋洋洒洒260万言的《中国书法文化大观》。这方面的文化推进和意义创新，值得申说。

在当代书法的文化定位这个书法发展的基本问题上，王岳川教

授强调书法的原创性并积极寻找国际审美共识，他坚持认为，中国书法需要具备一种大师气象和国际眼光。在他看来，21世纪中国书法艺术的价值取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只有真正具有原创精神的书法家，才能成为这个时代的书法大师。当代中国书法最大的课题在于，寻找一种国际性的“审美共识”——把结构张力、笔墨情趣，以及幅式变化这些语言，从本民族传统的审美空间，扩散到更大的现代文化空间中去，形成一种国际性书法审美形式通感或基本共识。这就要求我们要借鉴西方一些现代艺术的形式通约，并将其融入我们的本土文化内容，使之具备现代形式美感。在这个过程中，内容将会更多地变成意境，形式将会更多地变成语言，最终达成新内容与新形式的完美结合，变成国际性的、具有审美共识性的书法美。王岳川指出，从本土主义出发后，应该提出世界主义的书法。就是说，书法不仅仅是东方化的审美需要，也是整个人类的审美需要。

坚持民间书法和学者书法立场，使中国书法不成为一种过分匠气的技术，而是“技进乎道”、“宏于道”，是王岳川教授一贯的见解。他认为，当代书家应该从碑帖以外的空间寻求新的资源，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民间书法和新发掘出的书法资料中寻找——把碑学、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写经、民间墓志等很多新东西融入个人的书法创作。“现代书法”的探索，例如将绘画和书法整合起来，既可使书法更具抽象形态，也可丰富我们的书法感觉。当代书家不应只满足于技术性的创新或拓展，而应使自己“学者化”。书法不仅仅是技术，它更是一种“道”，最高的书法境界是哲学。只有具备了超越天地人之间的思想境界，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学术文化精神的书法家。

王岳川教授关于当代书法的见识，基于他在“文化研究”领域所作的思考。近年来，他提出了“文化输出”的见解，可谓相当精辟。他认为，近代以来，东方权力中心逐渐消退，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之国，而是成为一种“东方主义”式的边缘文化，在相当长时间里，“文化输入”成了主潮，这不能不是一种文化险情。如果中国全盘西化，甚至连汉字都要拉丁化的话，中国文化的传承弘扬将成为一句空话。如今，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保存我们的经典文化，为西方提供一种“另类文化”或“他者文化”，而应扬弃传统，力求创新，强壮主体，在新的国际文化格局中，提供一种差异性的文化认同。当今世界一流学者，在东西方文化问题上，基本上都是求差异，而不是求相同。从中国文化的本源出发，将西方文化作为一种映衬

参照，以新的文化创造形成不同文化间的互动，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时代课题。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现在应该保持自己文化的个性，这样当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以后，经过“拿来主义”之后整合的中国新文化，就有可能逐渐实现自己的文化“输出主义”！这种文化上的国际视野，和书法发展上的全球化视野，对于弘扬中国书法的文化价值、抵制文化误解、对抗有意误读，是一种具有战略性的文化见识。

提升书法的文化品位，张扬书法艺术的文化意识，成为王岳川教授的积极主张。他认为，不要把传统变成文本，而要变成一种精神，让它从我们每个人身上流过去。他坚持认为书法是一种学术文化，应有哲学思想贯穿其中，才能达到艺术创新。真正有学术建树和知识推进的书法家，在注重笔墨功夫和韵味（书法性）的同时，还应加强学术文化层面（学术性）的研修提升。书法，作为中国思想中最精微的部分，能够承载21世纪独特的中国文化精神。对于学界经常提及的书法反思，他认为有四个重要方面：总结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以及文化精神遗产；更新观念并对当代实验性书法的正负面效应加以批评总结；清理当代顶级人物的书法理论与艺术实践；将这些成果整合成新的文化成果和艺术形式，并策划组织英文水平高的专家，将中国书法界的代表著述译成外文在西方出版发行，输出中国现代形态书法实践的思想，使世界真正了解当代中国书法的文化内涵与价值。

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文化会不会被同质化、一体化？面对这个尖锐的问题，王岳川回答道：全球化不是同质化，也不是全球一体化，而是差异化、对话化、多元化。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西化不等于美国化，美国化不等于基督教化。在21世纪，东方文化将会在原本以西方话语为中心的文化结构中提出某些修正，形成一种调整，促成互动与对话。在当代文化的多元对话中，中国书法提出的一些新的艺术范式、新的智性范畴，可以作为整个国际文化新的资源和艺术创造新的动力，这也是真正意义的续接中国文化传统。在全球化的理论播撒、理论旅行中，中国不应该成为被动的接纳者。中国同样应该在全球化文化互动中从事理论播撒和输出新理论，形成理论旅行——一种对等的互动的“旅行”，使本土文化艺术和理论反思，能够真实地发生和生成在这片厚土之中，完成持续一个世纪的拿来主义之后的文化输出主义。在艺术对象、艺术接受方式、艺术传播机制、艺术价值功能都产生转变的时代，真正的艺术前沿践行者，理当通过自己的笔歌墨唱，为新世纪中国艺术实践和理论的创新和自我输出，提供坚实的文化观念和价值重建地基。就视觉文化范

畴而言，中国书法的非意识形态性和抽象性，使得西方有可能最大限度、最大面积地接受这一艺术形式。在中国书法普及了20多年以后，我们应当推出一大批书法大师。只有中国书法的国际地位提高了，才可能对日本、韩国、东南亚形成更多的影响，才可能从发现东方文化的精髓，发展到推出一个新的理念——中国书法文化的输出。在新世纪，书法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是世界的。

在当代书法文化批评方面，王岳川教授近年来发表了多篇讲话和访谈，其触及问题的深度，发人深思。他认为，衡量一位艺术家最好的尺度，就是看他在当下日益盛行的流行文化或泡沫文化前所作反思的深度，以及对历史的深切了解所达到的文化哲学的悟性。只有庸俗的评论家，才会不负责任地对一切新潮的东西都一味地叫好，才会毫无原则地进行短期行为的平面性文化泡沫活动。在现代性的境遇中，艺术家的“真”“伪”之别，在于其是怂恿价值平面化，还是追问思想的深度。当代真正的艺术家，总是一方面通过自己的思想传达笔墨意象，对艺术的深度意义进行视觉化的阐释；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改写，提供个体存在的价值呈述。只有这两方面的合力，方能使作品产生视觉冲击力和思想震撼性，填补平面化时代的体验空白和思想空白，为这个时代及读者对个体存在处境和人类命运的思考，营构起一方有意义深度和视觉力度的文化空间。

在王岳川看来，当代书法创作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为谁写”、“怎样写”和“写什么”。他认为，书法不能“赶潮”，那会造成一个时代的书法群体在羊肠小道上的拥挤和类型化。当代书法需要学术精神资源，只有当学术进入当代书法的思想和神经之中，民间立场与经典力度、个人色彩与精神境界、市场实现与价值提升，才有一个新的基础或平台。在这个新的基础或平台上所形成的不同书法精神文化进路，是书家个体自己的选择（并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这一点，在多元时代不仅需要，而且也是再正常不过的。

王岳川教授在学理层面的书法之识，显示了他宽阔的眼界和厚实的学养。他提出重视有价值的书法跨国化的文化交流，使书法和书法研究不再沉醉于本土昔日的辉煌中，而是参与到今日国际性的新话语权力运作关系网络中，进行全新的自我度量 and 自我定位，这对我们在思维上超越原有的书法价值估量，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他的学术思考，基于文化的总体发展性和变革性，使得他能站在超越书法技法的高度，看到书法调适文化差异、弥合文化对抗的文化力量，从而获得了中国书法文化

输出的超越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岳川教授具有一种学术前沿意识，一种文化多元开放意识，以及人文科学与书法多学科整合的务实进取精神。

除了书法理论批评以外，王岳川自身从小习字不辍，遍临名帖。上大学期间，曾经获得四川省大学生书法一等奖、全国大学生书法优秀奖、国家教委书法比赛一等奖等诸多奖项。在执教北京大学期间，长期从事书法创作和书法教学工作，以思集识，以识带笔，形成了他别具一格的学者型的书风。

王岳川教授早年专攻颜楷，用笔取势筋骨厚重，追求恢弘磅礴的大美。其后转向二王行草，用笔行中带草，方圆并施，又补之以学术浑厚之气，不激不厉，颇富文人韵意。再后取苏之酣畅意态和米之风樯阵马，结体稳中富险而兴随笔划，章法错落起伏而又真率自然。自90年代起，他全力攻草，潜心怀素、王铎，融入自家性格，使得书法既有文人情怀的温润，又有专家练达的风骨。其草书，善以线条切割空间，形成奇险结构。运笔时，锋酣墨饱，一气呵成。清劲飞扬的用笔，使字体间架上下呼应，左右顾盼，笔断意连处，更显出活泼飞舞的动势，整体上具有淡泊萧闲、冲气为和的境界，将古典草书的逸趣，转为一种今日文人的逸情；其楷书，则具颜真卿的凛然正气和率真神韵，显示出旷达的胸臆和从容的心性。

王岳川教授的书法美学追求，是线条运行所造之境。依我浅识，书法以线条为生命，气韵生动的线条，是最富有美学意味的语言。在王岳川教授的作品中，那些经过思想和感觉过滤的线条，以其纯净的运行轨迹，不仅述诸视觉，也述诸精神。那变化丰富、莫测端倪的线条集合，其势、其意、其味、其情，难以穷尽。在线条的舒展中，可见书家心手合一的纯度，已经化为一片天机的律动，让人通过这种指腕使转所留下的轨迹，反观书家的心路历程，体验书家的心灵世界。按王岳川的理想，中国书法在新世纪应当做跨文化输出的前锋使者。这个使者的本真性质，应该就是披染了文化情怀和具备视觉感性的线条。书法艺术那忘怀骋情的线之脉动，实在是心之脉动，是书家自在自为的“我之境”。这种最直观而又最内在的视觉艺术形式，应当成为不同文化间交流与对话的桥梁。

是为序。

范迪安

(中国美术馆馆长)

◎绪论

中国文化与中国书法

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嬗变，中国书法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迹化形式，并在现代世界中成为艺术对话和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

中国古典书法所具有的美学精神，是重要的。它在现代书法美学所倡导并推进的“回归感性、回归生命、回归人的整体”的审美活动中，使现代人稟有了一种强烈的寻根意识——“寻找家园”。它不仅使中国人在书法这一“写意哲学”中，体味到抒情写意的风神，也使西方现代艺术家在目光东移中，找到了精神流离之后的“艺术家园”。然而，中国传统美学范式的局限，又使得书家和书论家们急于清理根基而使书法稟有“现代”气息。当然，迈出这一步，也就意味着：既要置身于传统之中，又要超越于传统之外。

中国文化注重人文精神，肯定人性之善，以人道、人生、人性、人格为本位，强调仁心与天地万物一体和人的文化陶冶建构作用。中国人文精神深体“天人合一”之道，讲求天地人“三才”统一，以道德理性、感性慧心、人文精神为依，内外兼修。人文精神所标举的艺术精神，是一种“穷观极照、心与物冥”的人生审美体验和精神境界，一种技进乎道、以形媚道、以艺写意的审美人格的



孔子像

升华完成。

文化是“人化”与“化人”。文化与文明的差异在于，就本性而言，文化价值不属于物化领域，而是表达一种心灵境界和精神价值追求，反映一个时代的本质特性和走向未来之境的可能性。当代文化定位，是对传统文化的审视和选择的一种深化，文化重建不是固守传统或唯新是求，而是在文化选择中不断提高选择主体——现代人的文化素质。因为文化之根系乎人，文化的目的则是为了人——人自身的价值重建。

作为文化精神核心的艺术，是对主体生命意义的持存、对人类自由精神的感悟、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书法是人的书法，而人是文化的人。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写意达情的象征符号和中国文化意识的凝聚，是自由生命的审美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书法文化转型是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标志。它不仅标志着传统中国艺术对现代人审美意识的重塑，也标志着现代人的开放性使书法这一国粹成为走向世界进行文化对话的当代艺术话语。

中国书法是一种体验生命本体的审美符号。它浸淫于中国古老的哲学美学之中，在笔飞墨舞的音乐律动中，完成一种时空的审美形式，而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并为洞悉中国文化精神和华夏哲学美学品格，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文化视界。古老的中国书法，伴随文字的生成和意义的交流而出现，又伴随着抒情达意和文化转型，而向今天的人们显示其魅力。它召唤当代书法美学理论家，在中国文化转型中，重新审视书法艺术并加以文化定位和价值厘定。

当代书法艺术的价值定位，与整个世界的文化思潮紧密相关。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在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影响弥深，并生成和发扬为具有其本土特色的书法形式（如日本近代诗文书法、少字数、墨象书、前卫书法），进而导致中国现代书法产生受日本现代书道影响的“影响的焦虑”。同时，西方国家也在“发现中国书法”的喜悦中，吸收中国书法的精髓，去拓展他们的抽象绘画和现代、后现代

艺术。于是，西方艺术中出现了一种新画种——“书法画”，甚至有些画家被称为“西方书法家”。

国内有些学者对这种中国书法界与各国艺术家共结笔墨姻缘感到欢欣鼓舞。但是，也有学者对中国书法的价值定位并不高，认为“书法越来越由中国文化的视觉实在，而蜕变为一种民族的历史陈迹，或一种古董，换言之，书法的价值不在其艺术性，而只在其历史性”。“而西方现代艺术家对中国书法的赞美和吸收，恰恰代表着一种对无意识文化超越的决心。正是因为西方人有这种否定自我固有文化、引进外来文化的勇气，他们的艺术才产生了从未有过的革命性。”

无论是对中国书法影响他国艺术感到欣慰还是感到不满，都只是停留在书法价值厘定的表面。在我看来，正因为书法艺术精神是最具哲学精神的，因而也是最解放、最自由的，是一种心性之美、哲思之美、生命力之美。而也正因如此，日本学者井岛勉才在其《书法的现代性及其意义》中写道：“书法是一门以书写文字为中心而形成的艺术，但与其他艺术一样，作为艺术的书法，不仅仅是书写文字而已，它要求由此认识自己本来的生命。就艺术要求的认识生命而言，书法可谓最纯粹、最内涵的艺术。流动的书法线条，正是传导生命节奏的标记。”“它备受欢迎的主要前提，是因为恢复了书法艺术自由的创造精神，和认识到了现代的人类生命。简言之，在现代的环境中，它们再现了书法的本源。”

同样，英国文艺批评家赫伯特·里德也在其《现代绘画简史》一书中写道：“抽象表现主义作为一个艺术运动，不过是中国书法的表现主义的扩展和苦心经营而已。”他在为美籍华人书画家蒋彝的《中国书法》一书第二版作序时说：“第一次拜读蒋先生的著作时，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一美学与现代‘抽象’艺术美学之间的相似之处。”^[1]

事实上，西方解构主义哲学诗学，对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清算和对“书写”的高扬，使得西方学者得以重新发现东方书法的魅力。不了解这一重要的文化哲学氛围，对书法的深层次理论探讨，显然也就失去了时代文化背景。

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德里达，是后现代主义流派的风云人物，其解构思想非常复杂。在《文字语言学》（1967）一书中，德里达对张扬言说、贬抑文字书写深

[1] (英)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现代绘画简史》,刘萍君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

为不满，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同样的秩序控制着文字观，而形成“语音中心主义”。这种认为语音（说话）优越于书写的二元论语言观，这种“在场”的形而上学，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所体现出来的“暴力语言观”。德里达指出，言语同样具有意义含糊性、不确定性，在特定场合，说话往往还是对已经写下的书写语的复述。反过来看，书写也并决然成为思想的蹩脚的复述。书写胜过言说之处在于，它的物质铭刻性，具有阻断在场的能力。事实上，书写以铭刻的方式，维持了一个符号持久的知觉而禀有一种时空超越性。唯有文字能够永葆不灭，每一次阅读都将使作者在言说中“出场”。德里达颠覆了言语对书写的优先地位，使说话（言语）从中心移到了边缘，而书写则上升到新的重要地位。^[1]

这样，在中国人准备以拼音取代汉字以向西方人学习时，西方人却因惊喜地发现了非拼音文字的书法而惊慕不已。艺术家们发现：以团块、光影、透视色彩所构成的西洋画，以对现实尽善尽美的摹仿为能事，竟显得这样板滞和了无趣味，从而打破透视律，以书法线条取代立体光影，以水墨晕彰代替色彩涂抹，以线性笔意的抽象打破团块结构的具象。于是，在新的抽象画中，人们领略到了中国书法的风神意态和笔情墨意。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经历史沧桑的书法就已完美无缺，相反，中国古典书法走向当代，已经和正在发生审美转型，无论是用笔、用墨、结体、章法，乃至墨象笔意、气韵灵性，都发生着新的改变。随着在世界文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的形成，书法也将不断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这种转型，不是抛弃和重设，而是在继承和发扬的基点上，进行扬弃和再生。因此，文化转型中的书法艺术，将是充满自由精神的，它不是“现代书法”所能囊括尽的。它将避开西方中心主义的误区，清理传统的盲点，开始将融会中西的“经典性”精神质素，植入书法这一古老而又年轻的文化品格中，将传统的笔墨技法和审美韵味，整合入新的艺术形式中，生成新的多元多向的自由艺术范式——“文化书法”。

“文化书法”是在后现代主义反文化的氛围中出台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中超越传统书法观念和现代书法实验而提出的书法新远景。可以认为，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将会在新的历史契机中，使文化书法与其他书法形态一起，成为当代人的心性

[1] J. Derrida, *Speech and Phenomena, and Other Essays On Husserl's Theory of Signs*, trans. by D.B. Alliso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呈现,成为现代文化价值生成的审美符号,成为现代世界变革过程中不断嬗变流动的艺术精灵。那种认为中国书法因西方没有一门“书法”与之对应而必将成为弃儿终至衰亡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也许,正因独一无二,书法才会在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成为新世纪文化复兴的艺术形态。



老子像

几千年传统书法的理论和实践,滋养了20世纪书法美学和书法热潮。在新世纪,当代学人对中国书法美学的思考和对传统的吐纳所留下的书法艺术精神遗产,必然足令后世回味再三。中国书法的文化地基何在?当代书法挪用西方理论还有没有自我理论体系?如果有,这个体系的理论形态是什么?它在今天遭遇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怎样的挑战?其自我身份立场的基点是什么?这些都是书法文化理论必须直面并加以回答的。

在新世纪,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中国文化的价值定位已经有了坚实的世界性文化地基。在当今人类共处一个“地球村”的情势下,东西方“邻居”间互不了解、相互抵牾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在“太空文明时代”,文化无国界,华夏文化艺术将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书法文化将寓清新刚健的人生意识和高蹈执著的个性自由于现代性阳刚之美中,从而能够体悟宇宙创造生命的艺术魅力;中国新世纪书法,将以生生不息的创造力,融线条和意象于飞动简劲的节奏韵律中,去感悟当代人的超越精神和宇宙大化的生动气韵;中国书法新形式,将现代人独特的审美风范、审美心理和审美趣味,融注在一个最自由、最充沛的自我中,以强化了的主体意识,去领略沉思感悟中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潇洒美。

东方书法以线的飞动、墨的润华,心手相合,抒情写意,划出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精神轨迹。依这一轨迹而行,可以得窥其文化生命的幽妙之境。中国书法,是人生境界和生命活力的迹化,是最具东方哲学意味的艺术。在现代文化转型时期和东

方文化整体创新的历史节点，中国书法文化必将焕发新的光彩。

中国书法的文化品格，充满精神生态发展的魅力，在超越后现代的努力中创造这个时代“经典性书法”的历史重担，落到每一位有志有备的中国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面前。